

第十辑

〔美〕阿琳·卡多佐著 刘文哲 张煤 何文安译

铁三角中的现代女性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本书作者系妇女问题专家，通过广泛研究，对现代女性如何处理好工作、学习、家庭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记述了美国妇女创造的“事业——家庭——重把事业引入生活”的全新模式。对我国的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有可资启发之处。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铁三角中的 现代女性

〔美〕阿琳·卡多佐著

刘文哲 张煤 何文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牧群

封面设计：陆震伟

铁三角中的现代女性

〔美〕阿琳·卡多佐著
刘文哲 张煤 何文安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92,000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8,000 册

ISBN 7-80511-398-X/C·24 定价：1.45 元

序 言

“女超人”的消亡

一位 28 岁的洛杉矶女广告经纪人放弃了提升，以便呆在家里照看两个小女儿；一位 35 岁的芝加哥女会计，为了养育小宝宝抛下了一帆风顺的事业；一位 32 岁的纽约女医生撇开自己兴隆的业务，大部分时间在家守着 3 岁的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这些在高强度的事业中干着满份的工作，却又想在晚上和周末照料孩子的“女超人”，已经感到筋疲力竭，她们不再相信以前赖以立足的那种神话，即每位女性都可以既有专职的事业，又保持富有意义的、紧密的家庭关系。

于是，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事业型女性开始重新掌握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她们的作法是将自己依次纳入铁三角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潜心事业；第二阶段，专心作母亲；第三阶段，用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事业，使家庭和事业相得益彰而不是彼此矛盾。

这类顺应角色更替的女性能够在一生中最大限度地享受事业和家庭的乐趣。但是，她们能够做出

这样的选择,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历史的。

与“女超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五十年代那种“陷入罗网的家庭妇女”,她们被家庭牢牢拴住,没受过什么教育,工作履历几近于无。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在家带孩子。在外工作、养家活口不是她们担当的角色。这种情况从本世纪初一直延续了近六十年。六十年代迎来了社会动荡的风暴:愤怒的一代对美国的伟大提出了质疑。贫困、种族、宗教都在争取人权大进军中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对家庭结构的埋怨声也到处可闻,这声音不是发自担任一辈子挣钱养家角色的男子,而是来自那些感受到结婚、生孩子的社会压力的已婚母亲。1963年,贝蒂·弗里丹,一位愤世嫉俗的妻子兼母亲,以她的《女性的秘密》一书集中反映了这种不满。弗里丹向女性发出了警报:她们可能独守空巢,孩子长大了,丈夫忙于事业,她们也许会百无聊赖地度过后半生。要想避免这种情况,仅仅在孩子出生前或长大后找个工作是不够的,妇女需要接受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像男人一样从事“真正的事业”。六、七十年代,弗里丹的接班人又提出了新的观念:所有的女性在一生所有的阶段都从事有薪金的工作。一个人的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程度,也就是一个人存在的理由。这一观点的国际化改变了一代妇女的自我意识。妇女解放为女性打开了以前紧闭着的职业之门,为她们提供了实现自我的新途径。大众传播媒介不断报道这一新生事物,文字和直观形象一同宣称:带孩子已非时尚;离家工作才是不同

年龄和处于不同生活阶段的妇女的大事！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妇女，孩子还在蹒跚学步的或已经入学的或已经长大成人的妇女与单身的、没有孩子的妇女全挤在同一口压力锅里扑腾。对奔事业和带孩子都举手赞同的母亲们好像吃了定心丸：她们能够顺顺当当、高高兴兴地同时兼顾两头。

神话一旦成了现实。母亲在家照顾孩子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母亲的或孩子的生活已不复重要。忙于事业的母亲一时成了时髦的榜样——傍晚和周末来访的一位不知疲倦的客人，抚育孩子在她们身上出现了全新定义：匆匆地亲几下孩子，祝他们晚安，睡前给他们讲个故事，这就是带孩子。本来嘛，男人不在家带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晚上和周末才回家。女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由这种新理论产生的是一种崭新的“女超人”，她们每周工作40或50小时，有时达60小时甚至更多，和丈夫一样尽力攀登成功的阶梯。早上笑吟吟地催孩子起床，安顿好，下班后回到孩子身边，因充实的一天而容光焕发，高高兴兴地准备晚饭，听孩子讲讲白天的情况，给他们念几个故事，然后与丈夫一起外出听音乐或是玩。为了调剂生活，有时也和外界的朋友共度黄昏或周末，保持一两种小爱好。这就是她们理想化的生活。

丈夫们受到号召，要成为更加主动积极的爸爸，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擦汽车，分担所有传统上归妻子干的活。但是，就连得到这样全力支持的妇女也不能不发现担任两个满份的活——搞事业和操持

家务——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女超人”的生活中可没有喂孩子奶，通宵守着生病的小家伙，为刚学走路的娃娃穿好衣服，送到日托中心再挤车上班，一有老师电话就放下工作，还要开家长会。显而易见，在“女超人”的设计中有一处重大错误：忽略了她是女性这一事实。社会平等已深入人心，但却绕开了生理上的不平等：女性能够做男人永远无法办到的事——怀孕和生养孩子。

问题发生了：“我整天在外上班，谁来照看孩子呢？”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性别、生物宿命论和心理学等方面都忽视了母亲的一种本能要求：在生理上接近孩子，和他们建立、保持感情上的紧密联系。孩子可以交给奶奶或是请人代管，送进那些“刮刮叫”的育儿中心，托付给热情而充满爱心的保育人员。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谁能责怪奶奶不肯照看下一代？“刮刮叫”的托儿所即便在今天也并非遍地都有呀！

“那么，母亲们一对一地照看孩子又怎么样呢？”理论家们在这一点上又强调了“女超人”的信条：重要的是使用时间的质量，而不是大量的时间。

不错，高效率的五分钟胜过低效率的一小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想成为“女超人”的母亲在办公室忙乎一天，加上长时间往返，已经筋疲力竭，她们常常纳闷：高效率的时间究竟在哪儿！

实际上，许多“同时得到一切”的女性并没有按部就班地生活。当孩子生病，家里没人照顾的时候，当她们给戏法一般变化莫测的工作和家庭责任搞得

疲惫不堪的时候，当感到与孩子、丈夫甚至自己都没法沟通的时候，她们往往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事。因此，她们更加努力，尽量平衡对自己的要求，调整时间安排，重新制订计划，给孩子另换保姆。然而不管使出什么招数，她们仍旧感到紧张、疲劳，尤其糟糕的是，她们感到受了骗：自我实现到哪儿去了？特别是当高强度的工作与做母亲所需的种种要求挤干了一个女人的时间和精力，已没有什么留给丈夫、孩子和自己，这时，每个女人都禁不住要问自己：我什么事做错了？

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一代清醒的女性重新对问题作了反思，她们向“女超人”体制赖以建立的前提发出了挑战，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当发现答案虚假不实或文不对题时，她们便重新树立观念，作出自己的解答。

她们破除的第一个前提是已经过时的女权教条，即男女始终应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相同的作用。这些女性知道自己能够和男同事一样恪尽职守，但并不希望这一事实捆住妇女的手脚。她们相信所受的教育和工作上的履历有助于行使而不是代替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女人，她们有哺育下一代的权利和责任。

现代女性提出挑战的第二个前提是“代理儿童教养”所依据的信条：保育员完全可以将与母亲一样的爱心和关怀赋予孩子。这些女性认为代理教养与自己照看不一样，她们不愿意让孩子在发育初期的几年去受一个或一连几个保育员的影响和熏陶。她

们知道唯有自己才拿得出孩子成长最需要的东西——持续的爱。自己的身体力行和反应会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宝贵的人生起点。

这些现代女性已经剖析了有关“女超人”的华丽文词，将事实曝光，全力奔事业和全力做母亲相结合，结果只能产生紧张、疲劳、矛盾、愧疚、怨恨，以及女性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远远谈不上产生自由和充实的感觉。

角色更替于是成了越来越多的想要得到一切——事业和家庭——的金钥匙。决定改变角色的女性首先完成教育，取得工作经历，接下来在生养抚育孩子的几年中放下专职工作，然后——随着孩子长大——开拓新路，将职业活动重新纳入自己的生活。这些女性既不是“家庭妇女”，也不是“工作妇女”，而是人本身。

潮流变了，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向做母亲、带孩子大泼污水变成八十年代中期对专职母亲们的热烈反响。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做专职母亲已不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活方式。这是当今对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性的一种选择，她们已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大显身手，她们相信，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抚育孩子是一切选择中最重要的选择。当这些女性准备好重新将事业纳入生活时，她们将设计出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让家庭与事业水乳交融的美梦变成现实。她们完全有资格创立这种和谐。

目 录

序言 “女超人”的消亡·····	1
第一部分 变化中的焦点·····	1
1 胸有成竹的女性·····	1
2 两难中的现代女性·····	9
3 共同的希望·····	26
4 角色更替的经济学·····	34
第二部分 黄金岁月·····	43
5 从事业到做专职母亲·····	43
6 寻找与创建一个不断壮大的团体·····	54
7 充裕时间里的好妈妈·····	65
8 “属于我的时间”·····	76
9 准备重新工作·····	85
第三部分 新条件下的新日程·····	95
10 在新条件下·····	95
11 掌握自己的时间·····	110
12 改变机制·····	120
13 超越机制·····	133
结束语 明天的世界·····	149

第一部分 变化中的焦点

1 胸有成竹的女性

谁作角色更替？

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已婚女性都面临着角色更替。人们普遍的认识是，专心养育自己未到学龄的孩子是当今母亲的压倒一切的抉择，这一点已经不足为奇了。1984年7月美国劳工局统计报告表明，68%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没有从事全日制有薪工作，其中半数以上(52%)全天看孩子，在孩子6岁前干一些不拿薪水的活(另有16%工作半天，有一些每周仅离家工作几个小时)。

选择自己带孩子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抛开事业的女性都是轻而易举的。现代女性通过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进行角色调整：一种相对短些，并且易行，另一种比较费时，也要困难得多。

促使女性轻松地或苦恼地抛开事业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职业和工作地点，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的因素是女性接受男性的事业准则的程度如何，这种准则宣称，事业是人生的焦点，代理教养儿童的理论(由他人养育孩子)则是这一准则的基础。

接受这种准则的女性，在试图将这种说法运用

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时每每感到十分矛盾。相反，拒不接受代理教养理论的妇女这种矛盾心情就很少，哪怕她曾经接受过“事业是自己一生的中心”这种准则。

愉快地抛开事业

男性的事业准则是当今女性的跳板，这种准则所依赖的实际是代理教养儿童的理论：以男人的方式去干由男人从事的工作，自会有其他人来看孩子。

明明知道自己终将抛开事业以照料孩子的女性是不承认这一套的，她们与古往今来的女人一样，把生孩子和抚养孩子看成一回事。她们会一开始就因事业或为了经济而推迟妊娠，但影响到她是否要孩子的主要因素却是出于自己将成为从早忙到晚的母亲考虑。尽管她可能在婚前甚而在怀孕前已接受“事业是自己一生的中心”这一准则，她仍然会将“代理教养”的理论看作与自己要做母亲彼此矛盾而加以排斥。

由于要孩子和自己带孩子是同义词，她们往往在孩子出生前便离职，并与丈夫一起安排开支。在第一个孩子诞生以前的几年里，他们大多不会把两份收入花光，而是用女方的薪水购买一次性的大件或者存起来，日常开支用丈夫的工资，因此，妻子存款减少并不构成经济上的窘况。

然而，这种轻松的画面却往往使那些尚由于撇不下工作而处于矛盾中的女性多有微词：“她们这么

轻而易举就把工作撂下，肯定事业上不顺利。”

那么，那些胸有成竹地抛开事业的女性果真是平庸之辈吗？显然不是。放下事业去养育孩子，这种把握似乎与事业成就并无联系，我采访过的一些很有成就的女士——按当今行市的薪水标准、职务以及上司和同事的评价来衡量——离开岗位都十分轻松愉快。这种把握性与女性在人生某个特定时期对自己事业的估价和对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的估价的关系，远远超过她对自己在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大小的估价。按照她们的选择，在她生活的一定时期内花时间带孩子，孩子就是第一位的。事业虽然重要，但不是生活的一切或终极，尽可稳稳地撒手。

安妮塔·克洛芙就是毫不含糊地卸下工作担子的一位。她在波士顿郊外家中柠檬黄的餐桌上热情地招待我喝咖啡，她3岁的儿子和一个小伙伴在室内角落里搭小船；她刚出生的小宝宝在摇篮里酣睡。35岁的克洛芙告诉我，她抛开了已干十年的工作。“1972年我刚工作时想的就是我和我的事业这辈子也分不开，任何人别想让我分心。在薪水和晋级方面我的情况都不错，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开始追求心目中的另一种成功：嫁个能够共同生活的男人，抚育孩子，工作毕竟不是一切。

“我觉得，孩子从其他人那儿得不到我这样的亲近、爱和专一的关注。就算是得到了，我也会吃醋的，就像我丈夫从另一个女人那儿得到了爱情一样。既然是我的孩子，养育他们就是我的特权。”

我问克洛芙想不想三年前丢下的工作，她回答：

“不是经常想，有时我会匆匆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我记得自己的形象——身着崭新的工作服，津津有味地享受正儿八经的午餐——但我很少连续不断地怀旧。眼前的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角色，现在是一门心思当妈妈。我干了十年满份的工作，眼下我觉得自己理应至少摆脱工作，对家庭尽到责任。”

然而，“钱怎么样呢？”我问她。“我辞职的时候薪水很优厚，没结婚时绰绰有余，一旦结婚当然就更不成问题。还在当姑娘的那会儿，我每年都把一部分工资拿去投资，结婚以后有两年全部工资都存起来。这笔存款等于在我丈夫的工资上加了一笔额外收入。”

克洛芙对于今后重新工作也充满信心。她说：“我不知道到时候我工作过的那家公司有没有适合我干的活。不过，我有会计师证书、工商管理硕士文凭，又有十年工作履历，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税法虽然经常变，但基本的不会变。要是哪一天我要回去上班，我还是能行的。不过我倒是希望在家呆得长一些，不想让工作打乱我目前的计划；我喜欢孩子，盼着能和孩子一起度过我们生活中的这一段时间。”

显然，克洛芙由于想生孩子、带孩子而心甘情愿丢下自己的工作。她并不害怕长期失掉专业职位，她预见到自己最终将重返老本行，并深信自己有机会在人生的另一段时间里回到一个与她所辞去的职位相似的岗位上。

克洛芙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许多胸有成竹抛弃

工作的女性的特征。一个哥伦比亚法学院女学生，成绩优异，24岁毕业，在纽约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找了份工作，四年后，在她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去职，她也相信：“我要是想再去一家大公司，那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名牌学校的优等生，又有在一家令人羡慕的公司工作四年的履历，往后还可以干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要是我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无所作为，那即使再加十年又会怎样呢？”

某出版公司的一位前任女总编同样胸有成竹：“我已经在出版界干了九年，凭我干这一行的全套本事，我不信五年、十年不干就会使我远远落在后面。我保留了一些主要的门路，搞些高层次的咨询，一旦准备重操旧业，我会紧紧盯住适当的机会，然后抓住它。”

几乎无一例外，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抛弃职位的女性都对自己在本行中的能力颇有信心，她们将这种信心与灵活性、想象力结合起来，认定自己将在不同的生活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这种能力。这样，她们不是一成不变地回到一个特定的公司或岗位，而是凭借能力重返本行。这类女性在事业观方面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她们将自己以往的成绩看作自身能力的旁证，而那些举棋不定的女性则往往将已有的作为看成过眼云烟。

有一些像克洛芙这样的女性打算重返本行，也有一些女性在离开岗位前就转入了新的类似的行业，或是回到学校接受专业进修。她们把抚育孩子与最终改行或作一些调整的可能结合起来，以便她

们放下眼前的工作，花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当妈妈，然后重新工作或是念书等，就不会遇到大的矛盾。

红头发的珍妮·克伦茨长得小巧玲珑，她在第一个孩子降生时辞去了密尔沃基一家保险公司职工培训部主任的职务，她说：“我在心理上对离职有所准备，虽说经济上会有些困难，可能几年内没办法买房子。但我们想今后我可以转行。我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公司，提升很快，在那儿工作了三年半。当时就准备干点别的，我写了个人简历，这是干好些行当的资本——商业、新闻、教育什么的。要是发现不合适，我就再去攻一个硕士。就是来个十五年不上班，还可以干二十五年以上。”克伦茨与克洛芙一样，对未来的工作考虑得很灵活，不同的是，克洛芙想的是重操旧业，而克伦茨打算开拓新领域。

除了干老本行或者改行外。有一些女性则不算再去上班挣钱。这样，宝宝和工作就不会打架了。奥尔琳就属这一类。

奥尔琳40岁时撤下干了十五年的记者工作，回家照看刚出生的女儿。而今过了两年，她又生了个儿子，就一门心思做起母亲来。回首当初的决定，她毫不后悔。

“说真的，我当时对这种情况已有所准备。我参加过豪华的宴会，尽和大名人打交道。有时候我一大早就躺不住了，真是没治，充满了挑战和新鲜感。

“可过了一阵，我也产生了好些男人对工作的那种感觉，一旦掌握了，搞好了，也就成了老一套。所谓挑战和兴奋，只是在你第一次取得成绩时才领

略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难以做到精神饱满，那种新鲜感和挑战情绪已经消失了。

“我当时准备的另起炉灶，是孩子们帮我做到了。我20多岁的时候还挺孩子气，没有意识到我给孩子东西有多重要。到了我这个年龄，人对什么是生活的理解才算全面了。就我眼下来说，就是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这些年我又要带孩子，又要将演员、作家搬上银幕。

“到孩子全天呆在学校里的时候，那我就要另外找一种工作。我辞职的时候，公司要我留下，想干什么都行，但我不想那么做。这种工作半天怎么行呢？那会打破业务的连续性。”

珍妮·克伦茨和玛丽·奥尔琳的例子说明，在中断事业，全心料理家庭这一方面是无所谓什么“恰当的”或者“更合适的”年龄阶段的。珍妮·克伦茨在进行角色更替的母亲中属于年龄偏低的一极，玛丽·奥尔琳则靠近另一极。

克伦茨和奥尔琳在中断事业的时候都做好了转向的准备，她们认为抚育孩子就是新的主攻方向，没有必要同时应付外界和家庭两方面的挑战。

玛丽·奥尔琳这样不打算再找一份工作挣钱的为数并不多，绝大部分心甘情愿抛开工作的女性都希望重新开始的事业伴随着家庭有了相当的发展，而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尽管如此，事业对于她们也并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她们很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完全中断事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们在经济上相当洒脱，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很乐意